



康有为故居



孙彦明故居



桂公馆

# 北京名人故居：旧时处，今何在？

■ 本报记者 张文静

为了编写《难忘旧时处——北京名人故居摄影图集》一书，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李秋生带着学生走过了北京100多处名人故居进行拍摄、采访。但如今，在李秋生看来，无论是拍摄与书写，还是对北京名人故居的保护，现在都还远未完成。

## 跨车胡同 13号

北京西二环内，坐落着一条金融街。在那里，金融机构的高楼大厦建得富丽堂皇，现代感十足。就在金融街对面，一座斑驳的老院子安静地留存于此。院子大门上的门牌清楚地记着当年的地址：跨车胡同13号。这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故居。

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曾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相传因胡同中曾经有个造车的厂子而得名。如今，这里可能是北京最短的巷子，约40米长的胡同里只留下了齐白石故居一个门牌。在四周摩天大楼的包围下，这处院落如同孤岛一般，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

“1937年北平沦陷后，常有日本人和汉奸来这里上门索画、买画，齐白石在自家门上贴出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的告示。但并不奏效，仍有不少鹰犬上门纠缠。齐白石再次贴出告示‘停止见客’。谁知还是无济于事，无奈，他干脆写了‘白石已死’四个字贴出去。”李秋生介绍说，解放后，齐白石的弟子李苦禅、李可染、好友梅兰芳、新风霞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近年来，金融街在此建成，这一带成了寸土寸金的繁华之地。故居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偶尔会有匆匆走过的人停下脚步，惊叹这座‘城市孤岛’的存在。”

鳞次栉比的现代高楼与充满历史痕迹的旧时院落比邻而居，可能正是如今北京现代城市发展与历史记忆共存的生动写照。如齐白石故居这样的建筑，在北京多不胜数。作为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居住着那些对中国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他们来到这里工作、生活，这些人的故事在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什刹海，宋庆龄、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梅兰芳等人在此留下了生活的印记；看王府井附近的清代贵族王府、民国权贵宅邸，则如同观看一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左宗棠、冯国璋、黎元洪、杜聿明、陈独秀等人就是在这里做出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种种决定；在宣武门以南一带，曾居住着康有为、谭嗣同等政治家与谭鑫培、荀慧生、李万春等戏曲大家；在末名湖畔，在清华园里，周



齐白石故居



孙彦明故居



李秋生供图 郭刚制图

培源、冯友兰、马寅初、王国维、陈寅恪等学问大家曾在这里漫步思索……

“北京文化名人故居最多，也最为集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介绍说，也正因为他们居住在北京，才让这座北方重镇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

李秋生则感叹：“论及名人故居，全世界能够比肩北京的恐怕只有欧洲文化之都巴黎了。”

## 有形的、具体的、感性的历史

这些建筑的主人已经逝去，故居能够留给后人什么？

在李秋生看来，名人故居不只是陈旧的宅院，而是一个城市的文脉。“如果失去了它们，我们的城市或许只是一具苍白无力的躯壳。走进故居，我们仍能直观地看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印记，感受他们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了解他们为历史作出的贡献，感受历史的分量。”

关于名人故居保护，美国相关法律的名称是《国家历史保护法》，这个名字让李秋生印象深刻：“美国人显然将故居这类历史建筑看作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是有形的、具体的、感性的那部分。”

确实，故居坐落在那里，俨然就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叙述者。比如，据李秋生介绍说，北京的清代故居基本上形成了王府类故居在城北、汉族知识分子和戏曲大家故居在宣武门以南一带的格局。“这是因为满族入进京之后，从宣武门划界，宣武门以北是满族人居住的地方，宣武门以南一带被称为宣南，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汉族人不管做了

多大的官，比如乾隆，也必须住在南边。民国以后，汉族人才开始往城北迁移。”可见，仅名人故居所在的位置，就能折射出历史的面貌。

在邱运华看来，故居能够筑牢我们的文化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由多种因素构成，有思想性质的，以理念、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呈现；也有意象性质的，以具体形象的方式呈现，例如人物形象、器物形象呈现；还有以立体具象物体形式呈现着。故居就是以具象物体方式呈现着的文化记忆。”

“文化名人的故居是北京城市最具有魅力的文化符号。每一处故居都记载有文化人的情怀，每一处故居也都蕴含着面向未来的志趣。”邱运华说，“文化名人故居作为文化载体，其展示方式是全方位的，远超过了纸质媒体作为载体的局限，也超越了音像媒体有限的视角。故居不仅在空间上展示出居所主人生活环境的轮廓，而且提供了往返流连、驻足沉吟的余地，你在风和日丽、狂风四起抑或暴雨淋漓的气候下，都可以体验故居主人的思想、情感体验，这是在其他任何一处风景物前无法经历的体验。”

## 保护刻不容缓

正因如此，在几年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才立意支持对北京城的文化名人故居进行抢救性调查，由此就有了后来李秋生团队的工作。其中的“抢救性”三个字尤其让人胆战心惊。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北京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名人故居被拆除，包括曹雪芹的‘蒜市口十七

间半’故居，扎公府李鸿章故居，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八道湾故居后院和书房等。”李秋生介绍说，十几年前，他曾拍摄一部关于宣南文化的纪录片，当时致力于宣南文化保护的黄宗汉对他说的这句话让他记忆至今——“他们连曹雪芹故居都敢拆，你问可俄罗斯人谁敢拆托尔斯泰故居？”

除了已经拆除的故居，留存下来的故居似乎也没什么幸运。位于北半截胡同的谭嗣同故居，也就是他当年被捕的浏阳会馆，“破败不堪”“私搭乱建”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北京的故居太多了，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故居都必须保护，城市毕竟还要发展。但谭嗣同故居必须保护，因为他是我们的民族魂。”李秋生严肃地说：“即使在各国革命中流血牺牲者众多，但像谭嗣同这样明明可以逃亡却慷慨赴死、以鲜血警醒国人的志士实乃千古一人。其后的仁人志士，如邹容、秋瑾、陈天华等都受到了谭嗣同鲜血的感召，他的鲜血成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旗帜。甚至在日本，谭嗣同也有众多的崇拜者。而且，从1912年到1919年，鲁迅居住在绍兴会馆，距浏阳会馆仅几百米。我曾在几百米的小路上徜徉，想象着鲁迅每天去教育部上班都要经过谭嗣同故居，再向前几百米就是谭嗣同故居的菜市口。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会想些什么？他这时期作品中的愤懑和怒吼以及那血淋淋的‘人血馒头’，与他每天经过的浏阳会馆有什么关系？”

在谭嗣同故居东面的李万春故居早已被拆除了。有关部门表示这是“落架大修”，即将房子拆成零件，编号，然后复原。但李秋生对此存疑：“我曾走进那个孤岛似的小院，尽管破败，但构架恢弘，结构坚实，用料考究，绝对不需要拆掉重建。”早在2011年，就在李万春故居即将成为孤岛的时候，比李万春大25岁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故居也曾面临房地产商的威胁。但后者附近的居民联名抗议，不允许破坏这一地区的原始风貌，于是艾略特故居得以保留。

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欧美国家行动较早。据李秋生介绍，早在1863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就确立了官方的名人故居挂牌制度，给名人故居挂上蓝牌，对故居进行法律保护。法国在1887年就颁布法律，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后又出台多部补充法规。美国从1966年开始对名人故居进行登记，设立专职机构统一管理。日本在1950年通过了文化财产保护法。

而反观我国，目前故居保护的法律法规、监管机制均未形成，全民的故居保护意识建构也未完成，保护故居的“修旧如旧”等基本原则尚未确立，甚至对名人故居的认定仍然较为混乱和模糊。“我们不一定完全按照欧美国家的做法来保护，但保护行动必须要开始了。”李秋生说道。

## 剧场

# 《桃花扇》诠释经典戏剧四要素



因《桃花扇》中有这样的句子：“春风上巳天，桃红柳绿如翦。正飞绵作雪，落红成阵。”所以江苏昆剧院将《桃花扇》的演出定名为“春风上巳天”。在一年一度桃花绽放的季节，全国巡演北京站如期而至。

《桃花扇》拥有一部好的戏剧作品应该有一切要素：家国情怀、爱情离合、悲剧结尾和足以震撼古今的经典台词。写人情而不溺于情，记事而不拘于事，于乱世离人中见萧条异代，于人世无情中看江山有思，从这个意义上讲，《桃花扇》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美之作。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桃花扇》所要表达的旨意，但我想“家国之思”和“悼明之亡”是最重要的一层意义，全剧的开始即在清明时节，侯方域因为有感于国事，心中烦闷而去寻访李香君。这个时间节点定下了全剧的感情基调——对于前朝的追念和因此产生的强烈的感伤情绪。看起来是写侯李之间的爱情离合，实际上如贾天祥的那方月宝鉴，要看到镜子的反面才算看。

不同于明末的董其昌，孔尚任有着深重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在《桃花扇》里处处可

见。对侯方域、史可法不吝赞美之词，而对阮大铖、马士英之流则极尽贬低之语，甚至对阮写的名作《燕子笺》也通过滑稽的笔法大加揶揄。过于脸谱化的表现可算是此剧的缺点，既然是历史剧，就应该尽量褪掉自己的主观情感，把历史人物还给历史而非将其置于一己的爱憎之中，任何历史人物都首先是被动的，应对其抱有一种所谓“同情的理解”，关怀处于特殊时空之下的个体的真实处境而不是基于后来人在不同时空里的主观判断。

孔尚任的高明之处在于明写爱情而又超越了爱情。侯方域因为写了一篇针对时弊、抨击侯臣的《留都防乱揭帖》而被李香君爱慕，二人成婚后，因为侯的却宦行为而使二人感情更加笃厚。侯方域被阮大铖陷害而与李香君离散，经过世事变幻，最后遁入空门，自觉没有脸面再见门外的李香君，终致二人天涯异路。侯李二人的聚散离合无不与南明的国事息息相关，孔尚任在这里表达出了一个意思，即所有家庭、个人的遭际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须臾不可分。侯方域是幸运的，虽然輿图换稿，江山易主，虽然国家、理想、信念都已明日黄花，但至少还有一隅青灯古佛可以陪伴他了此残生，做一只在新朝之下乞食的太平犬。

《桃花扇》的一个巨大成功是它的悲剧结尾。侯方域因为不在外地抗清，自愧辜负了李香君对自己的期望而终不与之相见，本已伸向门栓的手却又慢慢收了回来，二人就此异路天涯，曾经的海誓山盟与相偕欢好，包括彼此的定情信物——那把沾染有李香君鲜血的桃花扇都成空花泡影。《桃花扇》的结尾突破了中国人喜爱的大团圆结局，孔尚任不是一位说假话的好人，而是一位说真话的好作家，他把国破家亡之下人物的真实状态老老实实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人们不胜唏嘘。

提到《桃花扇》，不能不说《余韵》中那七段堪称千古绝唱的套曲《哀江南》，特别是最后的《离亭宴带歌歇指》。当年，梁启超在最好的时候用浓重的广东话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背着背着，眼泪就会扑簌簌地掉下来。也许，这些打动人心的句子可以使其后所有的乱世离人为之掬一把热泪。

《桃花扇》具备这四个要素，足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引以自傲的作品，它诠释了经典剧作的价值所在。

## 西洋镜

# 新版5英镑钞票引发标点符号之争

去年10月，英国英格兰银行发布了新版5英镑钞票，上面印有丘吉尔头像和他的名言：“我没有别的东西奉献，唯有辛劳、泪水和血汗。”因为将该名言的一些标点去掉，英格兰银行备受指责。学术界称，英国正处在“后标点时代”，英格兰银行作为一家重要机构，却不顾英文的正确使用规则。

新版5英镑为塑料材质，其初期设计稿上还严谨地在丘吉尔的名言上添加了双引号。但最终发布的版本，双引号却被去掉，这引起了不满。

英国国家读写能力信托组织称，现在这句名言既没有句号也没有双引号，有严重的语法错误。这一事件可能会在全英范围内引起对当今社会是否存在轻视语法和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现象的广泛讨论。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对路上的标点符号进行了改动，就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他们用马克笔把去掉的标点符号又补了回来，政府于是作罢。

伯明翰大学教育和就业研究中心教授艾伦·史密斯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标点时代”。“有人或许不以为然，认为我们是在卖弄学问，但是他们忽略了，精确的表达代表了缜密的思维。”

批评者称，货币设计师为了美感牺牲了正确标点。牛津大学英文讲师塔拉·斯塔布斯称，这种



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新版5英镑钞票引发了一场标点符号之争。

做法“降低了自我品格”，是在试图简化英文语法。“去掉双引号很奇怪，好像是5英镑说的，而不是丘吉尔说的。”斯塔布斯说。史密斯也指责设计人员“不懂语法”，这些人“更关心形状和图案”。

而英国文学界则为银行辩护。英皇家文学院主席丽莎·阿德里娅西称，如果丘吉尔在世，不会介意是否使用双引号和句号。“伟大的丘吉尔或许只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头像只是出现在5英镑上，而不是出现在意义更重大的地方。我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演说家，会不会注意到标点不见了。”

# 日本推出智能手机壳治疗手机上瘾

日本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适用于苹果手机的手壳，可以帮助家长阻止“熊孩子”们过分沉迷于智能手机。

这款手机壳被命名为Otomos，由日本Momo公司发明。它可以固定在手机上，只有通过一个特制的螺丝才能卸掉。Otomos可以与一款App连接起来，家长可以通过该App控制孩子日常使用手机的状况。如果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超出了每日规定，手机将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当手机壳内设置的运动检测器检测到孩子正在走路，也会将手机自动关闭，以保证孩子的安全。如果Otomos检测到明显的器械冲击，比如孩子发生了意外，它还会自动给家长的手机发送短信。

“我们征集了许多意见，了解了使用智能手机的孩子家长关心的问题，然后开发了这款产品。”Momo公司总裁介绍说，“Otomos的用法非常简单，你只需把它装在手机上。”这款手机壳在日本众筹平台Makuake上筹



为治疗手机上瘾症，日本公司推出了智能手机壳 Otomos。

集了约8000美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Momo公司计划向订购手机壳并购买了两年服务的用户每月收取5美元(约合人民币34元)费用。目前，Otomos手机壳只能兼容苹果手机。如果你的孩子使用的是安卓系统手机，目前只能找别的办法让他们远离智能手机了。(艾林整理)

## 声音

“那个时候学校学生少，算一种幸运：跟老师直接见面的机会特别多，可以手把手带着示范。”——敬一丹

由敬一丹等“50后”作者合著的新书《我·未代工农兵学员》出版，本书记录的是敬一丹与同学们作为“未代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经历。

敬一丹说，由于都是播音专业，同学们多半都在从事媒体或者和媒体相关的工作：“我特别幸运赶上了电视的上升期，同学们也都成为他们所在台的中坚力量”。

论及写书动因，敬一丹提到，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段时期，“每个到了年纪的人会和年轻人讲往事，这是一种习惯。但作为媒体人，有意识的记录、有意识的传播，这就是媒体人的本分”。

书里还写了当时的生活。“我特别喜欢吃面条，但我们大学食堂从来就不卖面条，病号饭倒是可以吃到，我就经常想怎么能生病。”

敬一丹也提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话题。她认为，这已经被全人类证明有道理，但是改变命运不仅仅有知识，还有时代、机遇，“我们这代人当时也没有觉得艰苦，并没有说多努力地坚持走到今天，那个年代造就了今天”。

“我个人认为京剧眼下最大的软肋是缺乏现代意识，而《大宅门》是一部有现代意识的京剧，是现代观众想要看到的京剧的样子。”——郭宝昌

著名导演郭宝昌携京剧版《大宅门》再度登台，直言：“我圆了一个梦，这部新戏，处处是继承，处处是反叛”。郭宝昌透露，把《大宅门》搬上京剧舞台一直是他的心愿，“事实上，从电视剧开始，里面就有很多京剧元素，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就存着把《大宅门》做成京剧的想法”。

郭宝昌将自己的此番圆梦之作形容为“处处继承，处处叛逆”，“我们无疑要继承京剧传统，但好的继承需要反叛，京剧《大宅门》的反叛渗透在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戏，渗透在乐队的组成，龙套的作用”。

京剧《大宅门》剧本由李卓群先后打磨一年多，最终把故事主线定在白家七少爷白景琦和花魁杨九红的爱情纠葛上。李卓群介绍：“这个戏里的人物打破了京剧本来的行当，比如‘白景琦’，根据剧情，要有武生的做，老生的唱念，还有小生的技法。‘杨九红’也是，花旦、青衣，女扮男装时还要小生。”

“写小说的时候比较能够随意发挥，但翻译作品的话，心中则怀着打消自我、谦虚谨慎的态度。反复切换这两种相反的模式，别让类似精神上的血液循环这种东西，变得通畅了不少。”——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在公开演讲中畅谈了自己对翻译的看法。他说，翻译工作“总是禁不住去做。几乎可以说是我的爱好”。他在演讲中还说，通过翻译“认识到自己还处在发展阶段”。他表示，“对于创作者而言，最恐怖的是在被固定的体系中奇怪地沉静下来”，还强调，“翻译就像是一扇通往外界的窗”。

“我向来不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真正以‘学者’的姿态写的文章统共没有几篇。但一个人总是会有个立场的。我想，我的立场是什么呢？就现在想来，我大概有三种立场：一、公民的立场；二、同类的立场；三、老师的立场。”——王富仁

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王富仁因病于2017年5月2日晚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王富仁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其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在学术界影响极大。他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全新视角阐释鲁迅小说。这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

他对自己从三个方面进行过定位。关于鲁迅：深邃的思想，我们永远解读不完。生活理念：以书为伍，追求简单平淡的生活。研究思路：倡导“新国学”，让心灵更宽广。(喜平整理)



王富仁